蘇聯語言學走上了新的道路

維諾格勒多夫著 余元龔譯

第一節

在蘇聯語言學史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已經滿了一週年。1950年6月25日在“真理報”的語言學問題自由討論欄中，發表了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一文。這篇論文在蘇聯語言科學的發展中，發生了基本的革命。它暴露了馬爾院士理論底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的本質、它對蘇聯語言學的未來發展奠下了堅固的理論基礎，並以非常明確非常精密的形式闡明了語言作為社會現象的本質，闡明了它的特徵，它的社會機能，構造，它與思維的關係，它的基本規律以及它的發展途徑。

在最近期間，斯大林對我們蘇聯語言學提出了三大任務：第一——消滅馬爾的門徒和其繼承者所建立的學閥制度；第二——把語言學從馬爾的錯誤中解放出來；第三——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實施。這個最後的任務——是主要的任務，而前二個任務——是對它的創造性解決和完成解放的必要前提和必要條件。

把馬克思主義實施在語言學中——便是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所提供的，特別是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中所提供的那樣基礎上，全面地研究一般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理論，並以世界語言的具體歷史研究方法來創作地發展這個理論。

包含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底斯大林論語言學著作，對語言學展示了光明的遠景，並以創造的馬克思主義底新思想和新結論豐富了一切思想戰綫的工作人員，一切社會科學家。

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指明了根據馬列主義的哲學和方法論以及促進共產主義社會建設底蘇聯科學進一步發展的任務。斯大林十分果斷地強調

着批評自由和意見爭論——是蘇聯社會中科學發展的規律。斯大林說：“一致公認，如果沒有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的，不可能進步的”。創作的討論，應該幫助着克服矛盾，應該幫助着統一的堅決的解決爭論的科學問題，應該幫助着探求真理。

思想家的偉大著作這樣迅速而順利地把語言學的發展引上新的道路，在語言科學中還是史無前例的。語言科學的歷史中，也找不出第二個對語言學思想的進展表現了這樣巨大而健康的影響的著作。

在蘇聯社會中，科學有機地與實際結合起來。蘇聯語言學理論基礎中的根本改變，需要高等語言學校和中等學校裏底一切語言學科教導制度的改革。

在相當短的時期內，編成了高等學校中語言學基本理論教程的新提綱。特別注意到語言史教程的正確組織。

着手重編充作專攻語言學方面的大學生和研究生用底科學研究工作之設計（還未完成）；依照斯大林的英明指示提出了新的問題。基本詞彙，詞彙，具體語言的構詞法，造句法，以及語言的相互關係和文體問題的研究，佔了重要的地位。

蘇聯的語言科學，不能脫離語言教育的實際而發展，特別是在我們多民族國家之中。

所謂馬爾的“新語言學說”，反映在外國語的教授法上，可能是非常有害的影響。關於馬爾理論中語言和思維的關係問題之不正確解決，引導到教育過程中本國語和外國語的互相作用問題之不正確解決，引導到鑽研外國語言時低估本國語言的作用，引導到翻譯的理論和實際意義之減低。

蘇聯科學院文學語言部和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教育科學院的聯合會議，以及繼他們之後的許多

學術、教育會議和討論會，給蘇聯教師們的工作指出了正確的科學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斯大林的著作，語言學問題已經成為全民的了。語言學的實際問題，在蘇聯科學工作者間，遭受了廣泛的創作性討論。

斯大林的著作，指出了文藝語研究，作家語研究，說話技術研究的新道路。

在20次第佛列斯市黨的會議上，格魯吉亞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察爾克維安(Т. Чаркван)同志，根據斯大林同志論語言學著作，提出了現代格魯吉亞的文學語言問題。他說及必須從它的擬古主義、不正確的土語和人為的語言構造所混亂了的影響中來保衛現代格魯吉亞的文學語言。格魯吉亞的知識分子，被號召起來為了爭取格魯吉亞文學語言的純潔和高度培養而奮鬥。

語言學的一般理論，不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割裂開來，不能與我們語言學家在民族語——特別是近代的民族文語——的發展和標準化中的極積極關心割裂開來。蘇聯語言學工作的實踐是與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不可分割的。它以斯大林論社會主義民族語言的發展規律的學說作為方向。

民族文學語言結構的定義或分類，文字結構，綴字法的研究，語法，辭彙的創造，學術用語——這方面是語言學家的專門工作——的制定和發展。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新型地闡明了語法的知識意義和教育意義，建立語言的基本詞彙之新的概念，指明了全民語言和方言在社會發展各時期中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作用的形式，並在這個實際領域內對語言學幹部提出了新的任務。

偉大的俄羅斯民族語言——我們祖國一切人民的最有力交際工具。千千萬萬各民族的人們都用俄語思索和說話，如用他們本族語言一樣。偉大的俄語，變成了全蘇聯人民語言寶庫中的無窮泉源。

第二節

蘇聯語言學家究竟怎樣依照斯大林的著作來創作地發展和研究一般的語言學問題呢？

蘇聯語言學理論底有成果的創作性研究，是與消除馬爾的錯誤聯繫起來。尖銳地提出了清除

語言學基層的任務，在語言學的理論和實際中根除關於“新語言學說”的邪說。這個任務首先要求詳細地，根據各種語言材料，從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立場來批判馬爾的一切總的方法論基礎和觀點。斯大林同志，把馬爾關於語言“階級性”的公式，關於語言作為上層建築的公式，馬爾的語言融合的理論，馬爾的語言和思維發展中的階段性的理論，以自己的分析作了如此批評的天才典型。

斯大林論語言學問題的著作，造成了蘇聯語言學家底科學創作積極性的巨大提高。蘇聯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付印了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庸俗化和曲解”為題的2卷選集(總篇幅計80張印刷紙型)。在這部選集中，把馬爾院士，梅什察尼諾夫(И. И. Мещанинов)院士，卡茨涅爾松(С. Д. Кацнельсон)教授，雅可符列夫(Н. Ф. Яковлев)教授，菲林(Ф. П. Филин)教授，以及“新語言學說”的其他代表者之許多著作，從斯大林論語言學說的原理中，加以分析和研究。與暴露馬爾和其門徒的錯誤關係上，在這部選集中發展了斯大林論語言學說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原理。

認為蘇聯語言學可以毫不困難地，迅速地，而且一勞永逸地克服馬爾的錯誤，那是過分樂觀的表現。對於這點，必須儘力與語言學幹部進行思想、政治的和科學教育的工作。

廣泛而全面地發展一下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在與他們的各種語言基礎研究上所結合起來的創作性實施工作。這項工作的首要成果，是二部選集：“根據斯大林著作的語言學問題”(1950年、國立莫斯科大學出版部)和“現代俄語的造句法問題”(國立教育出版社，1950年)，它已在出版物上得到了評價，並引起廣大蘇聯社會人士的注意和討論。在蘇聯科學院文學語言部會議上，在烏克蘭科學院和其他各加盟共和國科學院會議上，都發表了許多報告和演說。

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所作成的理論性文章選集，是最深刻和最完備的具體資料(“蘇聯語言學的基本問題”)。這部書裏闡明了基本詞彙的概念，確定了它既適合於個別的又適合於十分多種多樣的語言，例如俄語、英語、希臘語、亞美尼亞語，埃斯基摩語的具體歷史發展之規律。依照斯大林的語法定義和它的內容來研究例如俄語中的體、時、式那樣的語法分類的發展；對各系語言材料、研究

一下辭彙和語法分類的相互作用問題，在它的構詞法和造句法方面、分析一下語法構造和相互關係。在有些文章中，闡明了語音學與試圖確定語音學在其他語言學科中的地位有關的一般問題。以斯拉夫語和日耳曼語歷史中的廣泛例證作為討論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之論文，引起了特別的關心。

斯大林關於基本詞彙作為新詞構成的基礎之學說、提出了關於語詞的構造問題，提出了關於它對語法和辭彙的關係問題，提出了關於語詞的構造之分類的編纂問題，提出了關於各種語言史中，例如俄羅斯語言和日耳曼語言史中底語詞的構造之內部規律問題。這些問題也在理論選集中找得了反映。在這部書裏也刊登了若干著作，這些著作是試圖解決突厥語、烏格羅·芬語和印度·歐羅巴語底歷史比較語法之許多具體問題以及各種語言的歷史發展問題。還應注意關於民族語言，例如挪威語的構造之研究，以及關於語言的分離和匯合過程之研究。

這樣一來，便推進了一般蘇聯語言學在與各種各樣語言底歷史和歷史比較研究相結合上之主要原理的創立和發展的工作。

這項工作是集中在語言理論的如下主要內容上：

(1)作為社會現象、它的機能之語言本質，它與思維的關係，語言的全民性質和它對社會發展底意義。

(2)語言的結構，它的特徵；不變的“語言基礎”(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和處在不斷變化狀態中之語言底詞彙。

(3)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從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它的結構出發的(新的品質要素、新的結構要素之逐漸累積；詞彙和“語言基礎”變化底速度之不平衡性，語言的內部改進和其他等等)。

(4)全民語言和從那些語言——民族方言和各階級同行語——裏發生的“支派”，與社會史、民族史有關的它們發展的規律。

(5)民族語和文學語言在社會史各階段上的聯繫，相互作用和相互關係。

(6)文藝語，在全民語關係上的作家語；在作家語中作家風格和作品體裁的個別和全民的概念；文體和宇宙觀。

(7)語族(血緣語羣)的構成和發展問題，語言親族關係的確定方法，語言學和人種考古學，它們在解決民族和語言的起源上之相互作用，世界語言的譜系分類問題——與語言的匯合和分離過程中的一般問題有關。

(8)民族語的歷史發展問題——從氏族語到部落語，從部落語到部族語和民族語。

對研究斯大林著作中所闡明的民族語形成的過程，予以特別注意。首先給庫爾斯克·奧勒爾方言為俄羅斯民族語基礎這一個問題找出歷史根據。

(9)社會主義民族語發展的規律，俄語在豐富蘇聯各民族語底詞彙過程中的作用。

(10)語言學的專門方法，歷史比較法和它的缺點，它在語言發展的歷史過程底馬克思主義觀點基礎上的改進方法，血緣語族歷史比較語法的建立原則。

(11)依照斯大林論語言學說的語言學結構：辭彙學(研究詞彙和基本詞彙)問題，語法，它的基本部分——構詞法及造句法——的相互關係，語義學和它在語言學系統中的地位，語音學在許多其他語言科學中的地位，語詞的構造對於其他語言學科的關係。

今年的語言學研究大部分，是針對各種語言、主要是蘇聯各民族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的研究方面。文化建設和人民教育的實際需要，各種民族語言教科書和初級讀本的嚴重缺乏，也引起了語言學家的注意。

被激發起來的語言學思想的創造工作，正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幫助蘇聯的語言學家們瞭解了文學語言歷史發展的一些規律。他們從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書寫語言的形成過程和進化過程的階級基礎的觀念中，把它們(指歷史發展規律)解放出來。他們給文學語言的新的週期性奠下了基礎。他們提出建立文學語言史的新原則。

直到今日——與庸俗化社會觀點對語言現象的佔着優勢有關——詞彙的變化，也就是語言結構底更活動的和更不固著的因素，通常都放在文學語言發展特徵的基礎上。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從語言的一種質過渡到另一種質是由語言的基礎，

也就是由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的改變來決定的。在這方面，應當轉移一下觀察文學語言發展過程的重心。這時就發生了新的複雜的問題——把語言詞彙發展底基本階段與語言結構及其由一種質過渡到另一種質底逐漸發展的規律聯繫起來。

斯大林的著作，幫助我們精確地規定了文學語言和大眾語在社會發展的各時期中的關係。文學語言擴大了自己的社會功用並對全民語——在民族形成的複雜過程中——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在這個時期，文學語言與全民語融合起來了，但文學語言是以精密的標準，表達方法的精確和複雜的文體等特點，來和全民語相區別的——這是它內部的體系。

蘇聯的語言學家，應當在斯大林對於語言的社會本質之定義的基礎上，創造全民族的文體論的學說。民族語的標準化問題和任務，與同行語、狹隘地域主義窒息日常語作鬥爭問題和任務，對窒息現象的順利解決，就需要文體論的理論基礎。民族語的文體論，應當積極地促進文化語的長成。在語言學的這一方面，理論與實際特別結合得上，理論與實際有內在的聯繫。作家應當對於全民語在它發展中的文體論有深刻的瞭解，然後根據這種瞭解來寫作。

斯大林的語法定義，正如人類思維底長期的、抽象的動作的結果，對蘇聯語言學家提出了區別和確定在語言結構發展中底抽象化的基本形式之任務。要知道思維是發生於從具體到抽象，如果它是正確的，那末便不是脫離真理和事實，而是接近真理和事實（列寧，哲學筆記，國立政治出版社，1947年，146頁）。

斯大林論語言和方言的學說，論民族語在勝利的方言基礎上形成起來的學說，使我們能夠重新理解蘇聯的各種新造文字的語言的發展路綫，並使我們能夠改正現代語言建設的實踐中存在着的錯誤。例如，蘇聯北方民族的若干文學語言，如 *Эвонкийский* 和 *Эвонский*，脫離了自己的民族方言的基礎。這些語言的標準變成了人爲語。發生把全民語變爲各種方言的雜湊的混合體的危險。罕特族的北方各羣很難瞭解以中部方言爲基礎而發展起來的罕特文學語言，說中部方言的人通常還都精通俄語並且很少借助於自己的文學化了的語言。

在斯大林著作的影響下，這些擺在蘇聯北方民族語言研究人員面前的問題，就是爲了改正現存缺點而準備基礎的熱烈討論與研究的對象。

斯大林的著作，引起了全部龐大的、包括15種左右語言的烏格里·芬語言學著作的根本修改，並指引它走上蘇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道路。開始了烏格里·芬語底廣泛的歷史比較研究，展開了各別的烏格里·芬語的發音結構和語法構造的研究工作。

創造個別語羣的、甚至幾乎未曾應用過歷史比較研究法的那些語羣的比較語法工作，正在開始展開。例如，剛在斯大林著作出現以後，便廣泛地認識到以歷史比較法研究達格斯坦（Дарестан）諸語言的必要，使它們與其他的山地血緣語比較，並研究達格斯坦語與達格斯坦人民歷史密切關係下的發展方向。

古代語言——希臘語和拉丁語——史方面研究的衰落，是馬爾門徒底暫時優勢的結果之一。與歷史比較法密切結合的語言科學的這一部門，正在開始恢復。

我們正在準備從事古希臘語和中世希臘語、新希臘語（最先在蘇聯研究）的語法結構發展史和希臘辭彙學發展史的研究工作。我們正進行研究古希臘語詞彙中的埃及語成分，我們也正在根據馬克思主義對於語言融合的社會規律的觀點來完成拉丁語史的研究——提出拉丁語歷史發展的新概念；對拉丁語發展的內部規律予以極大的注意。

斯大林的著作，幫助我們對於蘇聯各民族語採用俄語裏的國際術語和俄語的社會政治的詞彙的方法和原則的問題，得到徹底正確的解決。

文化語和新造文字的語言的編造的實際問題；各民族語，如上庫曼、布里雅特蒙古語等的綴字法的整理問題；語言的標準化和民族術語發展的問題；翻譯問題等，在許多民族共和國和各省中都是很尖銳很複雜的。他們要求中央的語言學研究機構方面，例如，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面的積極注意和實際幫助。抱歉得很，語言學研究所對這方面的研究，顯然不够主動。由所謂“新語言學說”所產生的許多創傷，應當趕快治療。必須在極短時期內，創造以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說爲基礎的蘇聯各民族一切語言的語法。

我們可以指出，在語言學工作的若干其他部

門，還可以看得出在完成現代的任務上，有顯著的，有時甚至是極易覺察的落後性。

蘇聯語言學在“新語言學說”佔優勢時期——根據馬爾及其門徒的要求——當然放棄遺產和祖國的成就。斯大林給蘇聯語言學扭轉了它的歷史，他斥責了過去語言科學中底空洞而輕率的否定。

可是這一年來，敘述祖國語言學史的批評著作，我們還不多見。其實，馬克思主義對於受唯心論限制的科學語言學傳統，在許多方面不能完成現代蘇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任務與要求這個意義的闡明，可能使我們的一些語言學家對於許多錯誤懷有戒心。

有關語言與思維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是語言學家工作的重要部分。關於語言和思維相互關係的哲學問題，在斯大林著作中，獲得了新的深刻的闡明。可是，關於把語言作為思維的分解和實現的手段的問題，關於語言範疇對於思維範疇和事實範疇的關係，關於語法和邏輯學，關於邏輯學範疇的歷史發展，關於詞和意義，關於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等等，還沒有引起了語言學家和哲學家的足夠注意，還沒有在去年和今年獲得顯著發展。

顯明地擺在蘇聯語言學家和哲學家面前的，是暴露現代資產階級語言學唯心論和庸俗化唯物論底反歷史規律的任務。

語言學問題，如像是在社會性不景氣現象中的本質，在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和邏輯學的唯心論發展中，佔着重要的地位。形而上學和詭辯派的語言“假定性”的觀念，就表現出這些在美國特別找到溫床的資產階級哲學和邏輯學的唯心論思想的主流的特徵，它的說法是脫離歷史事實，脫離社會

發展和鬥爭的任意符號主義。值得注意，對西歐和美國最受影響的唯心論哲學的諸派之一，戴上語義學（即、關於語言意義方面的科學）的稱號，它對自己提出“語言的邏輯造句法”的創造，“語言的邏輯分析”的研究等等這樣的任務。維也納學派現代實證論者，他們的英國擁護者和美國語義學者所展開的語言的批評，以及語言的形式化和數學化，是唯心論的極端現象之一。

蘇聯語言學的責任就是要對資產階級語言學思潮施以潰滅性的批評。

蘇聯的語言學家，還應更努力、更團結、更迅速、更徹底建設蘇聯語言學的大廈，這個大廈的基礎已由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巨匠、斯大林奠定。

應用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上的任務，使我們全體有義務深刻掌握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有義務不斷提高我們的馬列主義教育的水平。

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問題”，證明了不斷發展不斷改進的馬克思主義底不朽創造力。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是現代各種科學的基礎。從停滯、保守和教條主義中被斯大林的天才解放出來並開始過着積極的創造生活的蘇聯語言學，應在最近幾年內達到較重要的成就。

蘇聯的語言學家們，肅清了語言學中的理論混亂和理論缺點，正在堅執地記憶着斯大林同志對他們、對他們的創造性的科學研究工作所說底鼓勵和充滿信心的話：“這些創傷的消滅，將使蘇聯語言學健康起來，把它引到康莊大道上，並將使蘇聯的語言學能在世界語言學上佔着首要的地位”。

〔譯自“真理報”，1951年6月20日〕

譯者檢討：

本文曾在去年“科學通報”第二卷第九期上登了一半，當時竟遺漏未將下一半譯出。造成這種錯誤的原因，乃是由於譯者對翻譯工作的不負責任，以及粗枝大葉草率從事的作風，當時根本就沒有認識到翻譯工作在革命過程中所擔負的重大任務，時常強調個人興趣，不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在工作上表現出敷衍了事的態度；通過這次三反運動，使我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我認識到過去想法的不正確，今後應在工作崗位上努力改造自己。此外因譯者俄文程度修養不夠，而又妄自尊大，不虛心接受別人的校訂，以致前半篇短短四千字的譯文，竟發生了許多錯誤，茲經龔育之先生指示及譯者重加校訂，已在本文內作了修正。

譯文的錯誤，對我國人民、對我們文教科學界是多麼嚴重的影響呢！但是我當時並不理會，也沒有想到譯出來的東西應讓一般人看懂。雖然我讀過翻譯界前輩關於提高翻譯作品質量的言論，而我呢卻沒有把翻譯工作搞好，這點無論如何是不能寬恕我自己的。今後我當保證根除這樣不負責任的態度，並保證以後的譯文盡力減少錯誤。

我檢討了這篇譯文的錯誤，並不是說以前的另外一些譯文就沒有錯誤了，而是相反地必有

許多錯誤的，將來一有機會，我當把過去所翻譯的東西再作一番深刻的檢查。

編者檢討：“蘇維埃語言學走上了新的道路”一文原刊1951年6月20日“真理報”經由余元盒同志譯出後交本刊於1951年9月二卷九期發表，但這只是全文的一半，並未譯完。因為當時譯者並未將原文附來，而編者工作粗枝大葉，未付審查，所以和譯者同樣地，沒有發覺譯文是不完全的。這樣，就發生了翻譯工作中和編輯工作中罕有的大錯，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除由譯者自做檢討外，編者也是需要深刻檢討的。

再者，余元盒同志的譯文不但是不完全而已，就以前半篇譯文來說吧，也是有許多錯誤的。譯文詰屈聱牙，意義晦澀，是通篇皆然，不必再說，嚴重的是歪曲原意不知所云。關於這種種，譯者已經作了初步檢討，而編者的責任實在更大。因為關於斯大林同志親自參加的語言學問題的討論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件，對此作詳盡的介紹是本刊應盡的責任；如果編者的工作態度是認真負責的，就決不會在刊物上出現這樣錯誤重大的譯文，像這樣的譯文，毫無疑問，是侮辱作者的，對不起讀者的。而所以發生這樣不能容忍的惡劣事件，編者應該負全部責任。再說，譯文的前半篇發表在去年九月，到現在，事隔七個月以後我們才來糾正錯誤，這也充分表示了我們在編輯工作當中的麻木不仁。

這一次的譯文是完全的；已經發表過的上半篇，如譯者所說，曾經龔育之同志指出錯誤，並經譯者重加校訂；下半篇，即以前未曾發表的半篇，我們會請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審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詳細地審查了譯文，對譯文的不正確和欠通順之處指出了許多錯誤，化了很多很多功夫。

感謝龔育之同志的指教，我們才知道了這個嚴重的錯誤；感謝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詳細地審查訂正了下半篇譯文。以後，我們自當盡力改正我們的錯誤，也希望讀者們隨時給我們批評。

蘇聯部長會議頒發一九五一年 科學方面斯大林獎金

蘇聯各報在3月13日刊載了蘇聯部長會議關於以斯大林獎金授予1951年在科學發明和文學藝術方面有卓越成績者的決定的第一部分，決定的這一部分宣佈對蘇聯優秀的科學家頒發九十三個斯大林獎金。其中包括二十萬盧布的一等獎九個，十萬盧布的二等獎二十八個，五萬盧布的三等獎三十個。此外，還有十萬盧布的兩個一等獎、五萬盧布的七個二等獎、二萬五千盧布的十七個三等獎授予教科書和通俗科學著作的編著者。

在物理和化學方面，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貝洛夫以他在結晶體的原子構造方面的科學研究，榮獲一等獎。已故蘇聯科學院院長瓦維洛夫以他的兩部著作“光的顯微結構”和“眼睛與太陽”被迫贈一等獎。化學家普列奧布拉仁斯基教授和車爾尼雅耶夫院士也獲得了一等獎。

在生物學和農業科學方面獲得一等獎的有：貝一比恩科教授和米申科（合著有“蘇聯及其鄰國蝗蟲誌”一書），科斯甲科夫教授（著有“土地開墾原理”一書）。

在醫學方面榮獲一等獎的有：“骨骼與關節結核症”一書作者科涅夫教授，在兒童高級神經活動方面研究成績卓著的克拉斯諾哥爾斯基教授。

阿夫迪耶夫教授以他的著作“東方古代史”獲得一等獎。

在教科書和通俗科學著作方面，布洛辛切夫著的教科書“量子力學原理”、伏羅日佐夫父子合著的教科書“染料及其中間產物合成法原理”榮獲了一等獎。

此外，尚有大批的物理學家、水力工程學家、化學家、地質學家、生物學家、醫學工作者、歷史學家等，因卓越的研究和專門的著作，獲得了二等獎和三等獎。

（新華社新聞稿3月15日）